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48

1992

扭扭丁托离，册册强册册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辛欺的坐人
 。丁籍斗世已，合强双强双强双强双强双强双强，强
 强强强的小量册，来强去强强强个个一，虽强强强人强全
 强全。册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一天一丁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命强史强强强丁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强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8期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编/田伏隆

副主编/高原 朴永子

责任编辑/杨锡贵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湖南省长沙市迎宾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长广准字第0152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5 字数180,000 印数15000

版次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k

定价/3.00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
48
辑

湖南文史

周谷城题

湖南文史杂志社

(00) 彭国新

(011) 湖南文史

(181) 目 录

(381) 即 录

(041) 即 录

地下斗争风云

我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

(8) 大革命的洗礼——第一个把热血洒在酃县的烈士朱子和
——一进敌牢在长沙——训育主任打破了我的饭碗和美梦
(107) 二进敌牢在一师——万里奔波在白色恐怖中找党——
在特科工作站加入中国共产党——大谋略家刘道衡——特
科工作站概略——深入新国民党，打进中统——洪帮最年
轻的“红旗五爷”——加深蒋何之间，甲派与乙派之间的
矛盾——外围组织，统战关系，“青年运动委员会”——
上层统战关系，曹伯闻及其家族——“青年运动党团”
“一二·九”运动——创办《更生》旬刊，宣传党的主张
——三进敌牢——四进敌牢——组织营救，摆脱中统——
进入新闻界参加“文教”——加入桂系掌握《全民日报》
——西安事变，转移广西，七遭追捕的开端

解放前夕我开展统战策反工作及武装斗争情况

湖南人民解放军益汉支队始末

(101) 即 录

(210) 即 录

回忆抗战中的狮子脑之战

建国后史料

记湖南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

频迎雨雪砺骨坚……………陈国达(96)

——回忆地洼学说的诞生和成长过程

水利工作35年杂忆……………余陈可(110)

大圳灌区工程——铁山灌区工程——管理工作

陈采夫与湖南的血防工作……………赵畅(134)

我与重修岳阳楼……………王乐明(138)

在改革大潮中崛起的慈利饮食服务公司…周保林 王采明(146)

湘籍国民党将领

(1) 陈永发……………故步工南断梓群央中已挺

爱国将领贺耀组……………谢德铭(153)

记国民党儒将——黄杰将军……………江风(167)

家世——东征北伐——中原大战——长城抗日——训练学

生——淞沪抗战——兰封会战——职掌军校——印缅远征

——战后调派——羁留异国——赴台以后——擅长诗词

书法——亲属简况

“困党低平青”——谢家其父周白曹，系关勉德县土

泥主，自党争直，肝信《书更》衣哈——依立“大·二”

——楚中雄魁往事钩沉——“姓文”戚参果国灌人批

星沙杂忆……………裴业隆(187)

(82) 震动古城的机场惨案——薛岳二、三事——抗日宣传——麟

(7半爪) 胡适讲学中山堂……………宋故翅支又益军效赖阴入南断

狱中纪事……………陈明(192)

事业成功之道在于勤奋……………刘筠(216)

(87) 平 曹……………甜之趣干碑由中站庭回

戏剧史料

排史司国重

湖南最早的花鼓戏班——南县新泰班

(88) 刘松培……………刘松培(225)

我与中央特科湖南工作站

一、大革命的洗礼

我是酃县人，1914年11月出生的。1926年夏，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二军由副军长鲁涤平、党代表李富春统率（军长谭延闿在广州），由郴州进入酃县，向江西进军。他们一进入酃县，就把当地北洋军阀政府的县知事（即县长）赶走，旧政权机构摧毁了，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群众革命斗争逐渐展开。冬天，有一个朱子和同志来酃县担任县农民协会的特派员，与李树彝、罗芳芝、周树帜（后叛变）等人组织国民党的县党部，担任常委。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县党部，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县委。朱子和同志（湘潭人）是主要负责人，他是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到酃县之后，农民协会成立了，群众发动起来了，首先离不了宣传工作，基本队伍是高小学生。在县城里面有第一高小、第二高小，算是“最高学府”，在当时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年龄大的有30多岁，最小的是我，是11岁进高小，13岁毕业。革命运动在酃县开展起来后，我正在第一高小。每逢有什么宣传活动，庆祝会、纪念会，打土豪，总离不了我们去参加，有时还演戏。那时我们不懂事，有时去作点农民协会的宣传工作，朱子和同志对我有些好感，事先总是告诉我如何讲，如何宣传。那时接受能力较强，叫我看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原本，关于马列的书那时很

少，在酃县无法看到。但朱子和同志对我经常讲“反帝反封建”，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要打倒封建势力，要发动农民打土豪劣绅，铲除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县农民协会和县党部领导的一切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口号起领导作用。因为国民党没有什么纲领。我参加县农民协会的工作，也参加了县学联的工作，曾由县学联派到南乡的六都、南湾、水口、浆村、石洲里和黄泥潭等地，发动各地的学生在校内成立学生会，加入县学联，选出出席全县学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为县学联募捐。我拿朱子和对我讲的道理照本宣科，讲革命的道理，讲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宣传妇女解放，禁止赌博和吸鸦片，反对卖淫，反对鬼神迷信。这些东西，实际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在县城里相继成立妇女会、商会、工会，也都离不开做宣传工作。可以说，我是初步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1927年4、5月间，朱子和给我讲，我要介绍你加入“CY”。但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五·二一”马日事变相继发生，朱子和很忙，没有为我举行入团宣誓仪式及安排组织生活。不过，朱子和是将我作为团员看待的。但我并未以团员自居。

二、第一个把热血洒在酃县的烈士朱子和

马日事变发生后，酃县东乡的土豪劣绅孙秉文、贾威（均客家人）组织了一支反革命武装“挨户团”，约有200人枪。县委在县城的一支武装力量是原来的县警备队改编的“工农自卫队”，只有一个连。虽然由朱子和领导，但是实际被旧军官尹节荣所掌握。马日事变后，形势险恶，敌人的武装力量强大，谣言很多，人心惶惶。我们只能继续在县城里扩大宣传，鼓舞人心，提出打倒许克祥，打倒范石生，打倒蒋介石的口号。

召，刷了许多标语。6月间，朱子和带领自卫队向茶陵方向进发，说是去打长沙。为什么要打长沙，当时我不知道，经过一个时期，才知道是要配合长、潭、平、浏农民自卫队进攻长沙，消灭许克祥反共部队。这件事，现在看起来是盲动和错误的，队伍才到西乡的深坑，未离开县境，警备队（自卫队）负军事责任的尹节荣（北洋军阀时期当过连长）因早已为贾威、孙秉文所收买，同土豪劣绅暗地勾结，伙同一部分不法兵痞中途叛变，捆起朱子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原警备队排长、班长、士兵，都是吃粮当兵为生的兵痞，他们的妻室儿女都在酃县，要他们去打远在五六百里远的长沙，是不愿意的。尹节荣把朱子和连同原警备队开回县城，将朱子和交给贾威、孙秉文，原警备队100多人向挨户团缴械。这是酃县革命的一次大挫折，我亲眼看到的。敌人成立了所谓“酃县人民审判朱逆子和特别法庭”。审判之前，将朱子和绑在县政府的大厅里，号召所有挨过斗的、罚过款的、游过街的、被打过土豪的（即农民到土豪劣绅家里去挑谷、牵牛、杀猪、宰羊、大吃大喝）的土豪劣绅，“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一齐到县政府去殴打、辱骂、残酷斗打朱子和同志。有的土豪打朱子和的嘴巴，打得口鼻流血，有的用拳头狠揍，打得一身青肿，有的再加一道麻绳，将朱子和捆得全身发紫。甚至有个70多岁的老太婆（她的儿子被戴过高帽子游街）用旧社会认为最肮脏不堪的“骑马布”（月经带）和妇女穿的鞋子去打朱子和，真是百般侮辱。摧残了几天后，再进行所谓公审，其实审也没有什么可审的。朱子和对党的秘密一句不讲，对公开活动，众所周知的事，侃侃而谈，无所畏惧。土劣们不管朱子和供不供，审一阵就用一阵刑罚，到第四天才将他处死。平常杀人，一上绑就吹起冲锋号，杀声连天，跑步冲向刑场。这次杀朱子和却不是这样，而是缓缓地在城内街道上游行示众。刽子手平日讲究快

刀不留皮，一刀将头砍断。这回却按土劣指使，先将杀人的马刀在磨石（即花岗岩）上将刀口砍钝，不砍脖子，而是用钝刀全身乱砍。朱子和被杀死在东门城外教场坪的青草地上，一边砍一边滚，大片的草地上都是血迹斑斑。连青草都被滚平了。断了气才割下头来，尸身让狗去吃，头用石灰腌起来，先在四城挂在城门上示众，然后送到东乡、南乡、西乡示众。从这以后，酃县开始了血腥屠杀。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吴尚）开到酃县后，被杀的更多了。我的许多亲戚、同学成批成批被杀。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那时我还谈不上阶级觉悟，但我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凡被杀的都是好人，杀人的军阀、土劣、挨户团以及他们的狗腿子、流氓地痞都是坏人。这是群众的眼光，也就是我的标准。从此我和反动派有了一条界线。我的第一个启蒙者朱子和同志，我从来也没有忘掉。

三、一进敌牢在长沙

1927年夏，我在第一高小毕业，成绩优秀，但在酃县无处升学。我父亲在1926年春便去世了，孤儿寡母，一门老弱，虽然每年还可收五六十担谷子，但是要还粮纳税，派捐缴款，要支付请人挑谷子的工资，还要受乡保人员的敲诈勒索。此外乡党邻里婚丧喜庆，都无例外地要花钱送礼，否则会遭人耻笑。母亲是家庭妇女，两个弟弟都在幼年，我是长子，也不过13岁，无业可就。家道中落后的日子一天天艰难起来了。1928年有个机会，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招考，酃县有一名名额生，我的舅父、叔伯都动员我投考，因为完全公费，短期训练，毕业后即分派工作。我们县里报名的有三个人，那两个都是旧制（4年）中学毕业的，他们没有能考上，我能考上主要是读过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原本，我的记忆力强，对于“党义”背诵，答得很好，作文也作得很好，至于英文、数学，我在

高小时用过功，所以不比他们考得差。那两个中学生，都是西乡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怀疑我被录取有问题，说一个小学生比读四年旧制中学的还行，可能相信吗？他们告状，告了我三条罪状：说我谎报年龄，14岁冒充18岁；二是捏造学历，本是高小毕业的，却冒充初中；第三条最凶，说我曾经追随朱子和，在朱的教唆下参加学联和农民协会的工作，是个“小暴徒”。他们这一告，设在湖南省党校的“铁铮义勇队”就把我抓了起来，关了十多天。但我本不是共产党员。朱子和介绍入团，也没有公开出来。至于农会学联的工作，那时既是大革命时代，连天家（学生）都干过，我们小学生不去也得去。铁铮义勇队没有拿到任何证据，又经亲戚担保，国民党省党校终于以我不是国民党党员，而是冒充党员混进来的为主要理由，将我清洗出校，还用了好听的名字叫“淘汰”。进党校前后不到一个月。这是我第一次坐国民党的牢。从此我对国民党不再有任何幻想。

四、训育主任打破了我的饭碗和美梦

1929年初，我母亲卖了几亩田，准备了一笔钱，坚决叫我去长沙上中学。母亲有两个思想：一是中军守寡，而我是长子，她有责任把我培养成为有文化教养的有用人才，才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其次，她怕我跑到井冈山去。那时红军常常从山上打下来。国民党反动军队虽然强大（国民党的第八军驻在酃县、茶陵），但红军不时下山攻城，屡打胜仗。1928年3月，红军攻占酃县城几天，成立过苏维埃政府，常建立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凡是有这种活动，我就象有一条鞭子抽着似的总要去参加。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多少马列主义，在家里又非劳动人民，为什么会那样？主要是从感性经验中看到了血的教训，好人被杀，坏人得势。我直觉的相信了。共产党，对红军有

良好的感情。我几次想跟红军上山，又觉得兄弟幼小，母亲可怜，每每有些犹豫。在一些同学走了后，我又后悔决心不够。母亲是同情革命的，她知道我的心思，不反对我对革命的向往，但认为我还年少，不应没有知识就离开家庭，耽心我跟红军走，便决心让我去长沙读书，借以防止我上井冈山。从1929年到1931年，我只读了两年半中学就毕业了。我进过三个中学，第一个是平大中学，一学期后转入复初中学，最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在这两年半中，思想认识上一步一步在提高，开始读鲁迅的书。在复初中学的三个学期，我看了很多的书刊。那时长沙有两个小书店半公开地贩卖上海进步书籍，左联文艺刊物与社会科学刊物。二年级（即1930年）我跟复初十几个同学（彭谦吉、戴慕申等）组织了一个“朝曦学术研究社”，出版了《朝曦》月刊，开始写作，得到当时学校校长（胡翼如）的支持，供给办刊物的经费。因为办刊物可以为学校增光。我们这几个人学习成绩最好。学校开展览会，曾把我个人的成绩作一个专栏陈列出来，作文、绘画都有。因此我得到了免交一半膳费和全部免交学费的优待，但我把训育主任刘道卿得罪了。此人本是个美术教员，但又想做官，接受国民党市党部的训练，加入了国民党，当上了复初中学的训育主任，中专管学生的思想，坚决反共。他教党义课，讲三民主义还没有我知道的多，而且任意歪曲孙中山的学说。所以他的课我不愿听，我提出的问题他也答不出来。他又教美术课，当时我自学一种装饰性的图案画，常在画上题一些新诗，拿画去向他请教，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常常面红耳赤，从此矛盾加深，说不尊敬他。加上一办刊物，我写过一些小说，讲过去的革命斗争，刘道卿更不满意，态度日渐恶劣。1930年末，期终考试结束的这一天，有个同学在寝室里招待客人抽烟，把帐子烧了。刘道卿立即将这个同学开除。我白天外出，本来不晓得发生了这件事。

到了晚间，有一个同乡找我，探问假期是否回家？我也就在门口小摊上买了两根纸烟招待客人，不料有人告密，被刘道卿一把抓住了，烟虽未抽，也要将我开除。由于一位事务主任和一批同学抗议，说不能背着校长（此时去了南京）将一个成绩最好的学生开除，造成学校损失。刘道卿才改开除学籍为勒令退学，发给转学证书。这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在复初得到极大的免费优待，开除我等于打掉了我的饭碗，将我求知的路堵塞了。

1931年春，我就跳班插入到育才中学三年二期，于暑假毕业了业。育才中学地处识字岭，我的教室正好面对刑场，常在上課之际，听到杀人的冲锋号声，看到刑场上杀共产党员。亲眼所见的血光、刀影、枪声不知多少。之后回到鄱县无所事事，找不到工作，闲在家里，非常苦恼。“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半个月，阳历10月，我背着亲人从鄱县跑到安仁与茶陵交界的界首，想和那里的几个同学商量，一起到东北参加义勇军。可是那几个同学没有那样的决心。我住了二三天，母亲突然坐轿子赶来了。她发现我失踪之后，从别人处得到线索，急忙追来，我只好跟她回家。

五、二进敌牢在一师

1932年春初，我遵照母亲意见，考上了第一师范。这时，日寇又发动了进攻淞沪的“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前线英勇抗战，蒋介石则多方阻挠破坏，结果是订立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南方战斗方殷，北方日寇又侵占了山海关，打开了进入华北的第一道门户，同时吞并了热河。随着国难的深重，情绪更为不安。我开始寻找怎样救中国的道路。除了购买上海的进步左翼书刊之外，还想方设法搜求马列主义书籍。1933年春，我从一师的图书馆仓库里封存的书籍中找到一本

《列宁传》，我就借了出来，偷偷地阅读。说来可笑，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是托洛茨基写的，翻译者是中国有名的托派刘镜园。那时，湖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对高中以上的学生，用种种手段进行毒化、侦察和钳制。一师发给每个学生一种《周记》本子，规定每周填报一次，其中有“一周要闻”、“时事感想”、“读书心得”、“思想问题”等栏，交由训育处审阅批改。我不顾一切，接连在周记本上作了几篇文章，反对何键的“读经复古”运动，认为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国难当头，读经复古决不能救国。还写了两篇文章，主张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积极抗日，收复失地。我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山海关和热河也被日本占领了，敌人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岂能以不抵抗主义为国策？惟有急起抗战，恢复国土，保我主权，才是正理。学校当局看到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种文章，训育主任廖莘耕和校长王泽衡就向省会公安局告密，引来公安局侦缉大队特务，先在四天的夜半前来搜查自习室内我的书柜、书桌和放在贮藏室的衣箱，查到了《列宁传》、鲁迅的《华盖集》和《生活周刊》、《北斗》、《莽原》、《语丝》等左倾刊物。但我并不晓得。

3月下旬的一天，快到清明节了，正在教室上课，训育处忽然把我叫去，交给两个便衣特务带走了。特务就这样把我逮捕了。我被关进设在“曾文正公祠”的省会公安局的监牢里（现少儿图书馆所在地）。被关以后，公安局长彭灼亲自审问了两次，第一次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后，就问我的家庭情况。我说：“寡母在堂，两弟年幼，生计艰难。”彭又问：“你有前科在案（指1928年被捕），为什么又再犯？”我说：“民国十七年我还是个不满14岁的少年，受人陷害，案情已结。现在并没有犯罪。”彭又说：“你反对国策（指不抵抗主义），反对何主席的‘尊孔读经’，难道不是受了赤化之

毒，思想反动吗？”我说：“国土不容丧失，主权不容侵犯。不抵抗主义我不敢苟同，否则岳武穆、文天祥就算不得民族英雄了。我并未反对读经，但我以为当务之急不是读经，而是整军经武，发动民众，举国抗日，这又何罪之有？”彭说：“你是强辩，先坐几天牢再说。”

第二次审问时，彭说：“你看列宁传和鲁迅的书，看左倾刊物，铁证俱在，难道不是左倾赤化吗？你加入共党，就应该招供出来，我可以从宽处理。”我说：“如果我加入了共产党，早就上了井冈山，从我家里上山，40里就到了。鲁迅并没有赤化，创造社的人还在骂他不革命。但他是个伟大的学人和思想家，读他的书无罪。《生活周刊》主编是邹韬奋，由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出版社发行。黄氏是教育家和资本家，邹氏出身圣约翰大学，是个爱国文人，从未闻他们左倾赤化。至于列宁，早年和孙中山书信来往，互致敬慕，都是古代伟人。不错，他是俄国共产党领袖。但是我国有两句格言，一曰不以人废言，二曰不以言废人。他固然是共产党，但其言论有值得研究之处，不研究又如何判别是非呢？尽管他的言论为我国所反对，但其人格也有值得研究之处。苏俄被四国进攻，是他统率军民打退的，寸土没有丧失，就不能以其言而废其人。我研究这些只是想找个救国的道理而已。”彭说：“那你何不研究总理学说？”我说：“我不满13岁就读完了原本三民主义，后来又读中山全书。复初中学的训育主任讲不过我，人怀恨在心，就把我开除了，把我的饭碗都砸了。”彭又说：“你们湖南还有许多伟人，曾国文正公就是一代名臣，同蒋委员长、何主席都在发奋研究，你何以不读曾氏的书？”我说：“曾氏著述浩繁，只部《经史百家杂钞》我就买不起，哪里还有资格读他别的书。”彭说：“那好，我编了这本《曾文正公嘉言钞》，几万字，你先读一遍，然后抄写十份给我。”

我在监牢里把彭灼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当作苦役，花了几天功夫将它抄完，对其内容并无任何印象。抄好之后，当面交给了彭灼，他唔了一声，说道：“字迹还算端正，天资也很聪颖，听说还是个孝子，要是思想上正道，将来必有大用。你写几句感想如何？”我被迫写了一篇三四百字的《跋》，略谓曾氏著述浩繁，学者不易钻研，若彭公所编语录，撮其大要，取其精华，倘能印行廉价以售，读者必获益不浅。

监狱外面，一师同学听说我被抓走了，立即为之大哗，纷纷主张向学校当局和公安局抗议请愿。一师原来为反对何键的甲派势力所掌握，抓我的时候，校长（王泽衡）一职已经落到乙派手里了，训育主任廖莘耕和教务主任杨某也都是乙派，都是何键的亲信人物。但许多教员和高年级学生同甲派的关系很深，刚被撤职的谢祖尧，在一师当校长多年，群众仍然不少。他们为了打击乙派，也都站在学生一边起来抗议，希图扩大事态。学生自治会为此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向校长王泽衡提出三次质问和两项要求。质问一，《列宁传》是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何以不能借阅？即使内容有不妥之处，也可以进行教育，何以随便把人抓走？如系禁书，学校根本不应收藏，你们是否故设陷阱来陷害学生？如系疏忽，你们首先有罪，何以罪及学生？质问二，一师校风向来重视自学，你们不从教育着眼，毫无证据便报公安局抓人，试问我们读书还有没有一点自由？质问三，我们的人身安全与公民权利到底有没有保障？两项要求是：（一）必须无条件释放刘少慕（我当时的名字）同学回校；（二）必须保障全体同学的读书自由与人身安全。王泽衡只好表示接受。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有家《全民日报》破天荒地发了消息，说一师有一个学生无故被捕，全体同学起来抗议营救。一师当局也只好写信给报馆承认。《全民日报》以同情我的口气发了新闻，反动当局既没有什么证据，群众和社

会舆论又都起来了，省会公安局关了我20多天后，只好放我回校，交由学校监督。公安局长彭灼还被迫来校向一师同学极力声明：对我没有虐待，事情出于误会。从此便算了结。同学们的两个要求完全可以答应。

六、万里奔波，在白色恐怖中找党

出了牢狱之后，几个比较开明进步的老师 and 同学，就同我接近起来。其中一个同班同学曹明道，他年纪比我大四五岁，曾积极参加过大革命的战斗，我们两人敞开胸怀，围绕抗日倒蒋和革命问题，热烈地交换意见，展开讨论。记得当时对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封建主义、解决土地问题和农民革命斗争等有关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的问题，早已在“社联”（主要）和“左联”所办的各种刊物展开讨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和革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问题，实际都已经有了定论。这类刊物我尽可能找来阅读，完全接受了这些观点。我和曹明道得出一个简单朴素的结论：要使抗日反蒋和反帝反封建取得胜利，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要做革命工作，就必须参加共产党，要有组织领导，不能单干盲干。我们认为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实践，首先要从救国救民、实现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角度出发。于是我们决心找党。这年暑假，曹明道说他认识两个汝城同乡，一个叫叶琦，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隐蔽在北平国民党军事政治分会的政训处。一个叫叶林，是叶琦的弟弟，在南京《中国日报》当校对，是个进步青年。曹明道暑假要回汝城，建议我由他介绍去找叶氏兄弟，先到南京找叶林，再到北平找叶琦。我从汉口到南京取得了叶林的介绍信，就在北平见到了叶琦。津浦路上还有一个插曲，车到蚌埠车站，被当年最凶

恶的宪兵第三团的宪兵从火车上抓了下来，他们说我所用的十四师的军用护照（可以免费乘车坐船，是向驻扎在汉口的一个同乡人，也是我在模范小学时代的校长陈志进那里要来的）是非法弄来的，我根本不象军人，又有穿军装，完全是假冒，将我捆在宪兵队里。幸而一个姓宋的班长是四川的高中毕业生，他因无力升学而被迫当宪兵，对我颇为同情，他说负责的驻蚌埠宪兵排长是湖南桃源人，你向他拉拉同乡关系，我再替你讲两句好话，他会放你。于是我对那位排长说：护照是真的，是为了投考大学而又缺少路费，才向十四师同乡要的。这个排长看在同乡份上，当天将我送进家旅社，交代老板不要收房钱和饭费，第二天又将我送上了火车，终于到达了北平。叶琦了解到我到北平是要找党，便说他所认识的地下党员，有一批已在暑假去了农村，9月间才能回来。一批已到察北，要加入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正在和日寇作战，一时都不会回来。于是他介绍我到保定去，找一位住在原保定军官学校里的国民党驻军杨营长（可惜他的名字我忘了）。我向他坦白地提出找组织的问题。他留我在营部住了几天，每天都抽出时间和我谈话。最后他对我说：“你的动机很好，但不切实际。你不熟悉北方情况，部队里的兵运工作还不能开展，我的营部没有缺额，不能安插你，也不能叫你下连当兵，找工作又很困难，没事做就不能生活下去，起码也要有碗饭吃才能干革命。你想在北平、保定找组织是不妥当的。其实党的大门是敞开的，眼睛是时刻盯着年轻人的，只要你坚定不移，我相信不难找到党，也许党也会主动找你。你还是应该回到你所熟悉的湖南去，一面享受公费继续读第一师范，一面设法找党。湖南是革命策源地，一定有党存在。叶琦和我们可以继续和你保持联系，以后有机会就帮助你。”他给我送了十块光洋作路费，要我先到北平见过叶琦再定行止。叶也同意我先回湖南。当时我的一个同